

剿匪英雄杨子荣背后的故事(2)

◆ 李继民

几天后，孟工头和一个土匪来到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。杨子荣让两名战士把土匪给绑了，并假意解释说：“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，只好先委屈一下，到了山上再说。”两个土匪觉得到山上自会见分晓，也没太在意，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虎山。

“座山雕”很狡猾，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。杨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哨卡，都让两个土匪上前搭话，然后把哨卡上的土匪也一块儿给绑了，一同押上山。过了三道卡不远，就到了“座山雕”的老巢。这是一个被当地人称作马架棚子的木棚。

杨子荣命令两名战士看好土匪后，带领其他战士冲进棚子，占据有利位置，枪口对准土匪。棚子里共有 7 个土匪，其中一个白头发、黑脸膛、长着鹰钩鼻子、留着山羊胡的瘦老头，这人正是惯匪“座山雕”。至此，杨子荣与战友们一举将作恶多年的“座山雕”及其属下土匪全部活捉。二团团部给杨子荣记了大功。

消灭了“座山雕”，剿匪任务并没有结束。1947 年 2 月 20 日，杨子荣又领了新任务。这次是清剿土匪刘俊章、丁焕章和郑三炮。23 日，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向土匪所在的屋内猛扑过去。慌乱中的土匪开始操枪，杨子荣立即扣动扳机，可能是天气太冷枪栓受冻，枪没有打响。这时，从屋内射出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了杨子荣的胸膛，杨子荣晃了几晃，便倒了下去。开枪的土匪见打中人了，吓得扔下枪冲出门逃走了。1966 年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有人怀疑孟老三（孟同春）一辈子隐居山上，夏天种大烟，冬天打猎，有土匪嫌疑，于是把他揪了出来。没想到，他心中有鬼，自己招供了。交代的时间、地点、情节与杨子荣牺牲时的情景一样，后认定他就是向杨子荣开枪的人。最终，孟老三被法院判刑 7 年，后病死。

杨子荣倒下后，战友们爬上屋顶，揭开房盖，向屋内扔手榴弹，终于把这股顽匪消灭干净。

2 月 25 日，二团的干部战士为杨子荣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安葬仪式。3 月 17 日，追悼杨子荣大会在海林朝鲜族小学广场举行。东北

民主联军总部授予杨子荣“特级侦察英雄”光荣称号，他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“杨子荣排”。

杨子荣参军后就随部队去东北剿匪，由于战事紧张，加之他当侦察员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隐蔽性，所以杨子荣没有给家中写过信。因为家里不知道他在部队用了杨子荣的名字，这就给家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。

1947 年腊月二十三日，村里一个从东北回来的人说，在牡丹江看到杨宗贵，说他“一身土匪打扮，头戴礼帽，穿黑棉袄，腰间插着两支匣子枪”。这天晚上，宋学芝和儿媳被叫到村公所受到一番盘问。村干部说：“人家都看见了，还能有假？”在第二年开春时，村里取消了杨子荣家的代耕，又派人把挂在他家大门口墙上的“光荣军属”牌子摘下来。宋学芝不服，一连上访多年，公社、县里和地区她都去过许多遍，单是去县里上访就有数百回之多。后来，县里认为证据不足，于 1957 年 1 月发给宋学芝一纸失踪军人证书。1958 年 11 月，又给宋学芝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证。

1966 年，宋学芝去世。老人到死也不知道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杨子荣就是自己的儿子。杨子荣的妻子因为得不到丈夫的消息，又背上了“土匪家属”的黑锅，再加上女儿夭折，自己得肺结核病无钱医治，忧思成疾，在 1952 年秋离开了人世。

寻访杨子荣身世的经过

1947 年 2 月杨子荣牺牲后，墓前只立了一块墓碑。碑上只记载了烈士的生卒时间是 1917 年至 1947 年，其个人简历、生平业绩则是一片空白。曲波在《林海雪原》一书中，也只是交代了杨子荣老家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农村，甚至连杨子荣的县份都无从获得。

1966 年，海林县委、县政府决定派民政局副局长关会元等一行 4 人去北京、胶东搜寻杨子荣的籍贯、身世和家庭情况。他们先到北京找曲波。第一机械工业部造反派诬蔑曲波写《林海雪原》是为自己树碑立传，曲波正在挨批斗。曲波只说，杨子荣是胶东人。他告诉

海林来的人说，杨子荣的战友孙大德也在北京。关会元找到了孙大德，孙大德也只说杨子荣是胶东人。

关会元等人又到胶东，虽然查出一些线索，但都不能认定。第一次北京、胶东之行，无功而返。

尽管初查未果，但关会元并没失去信心，他又拿出新的方案。1968 年 5 月，关会元率调查组第二次到北京，并找到了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。

部队副政委姜国政是杨子荣的老战友。听到海林县派人查询杨子荣的生平情况，非常激动。他说：“杨子荣为了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，又献出了生命，我们作为他的战友和同志，连他的身世都说不清楚，就太对不起先烈和后人了。”在当时“文革”的复杂形势下，他以部队回忆军史为由，把杨子荣在北京的老战友曲波、孙大德、刘崇礼、魏成友等人召集到一起，召开了老战友追思杨子荣座谈会。

老战友们百感交集，发言特别热烈。有的说杨子荣家在荣成，有的说在牟平，还有的说在文登，众说不一。但是谈起杨子荣的相貌和特征时，大家的口述形象却是相同的：长脸，颧骨稍高，浓眉大眼，有少许络腮胡子，身高一米七左右，爽朗、健谈。

为了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姜国政从部队抽出两名干部与海林调查组一起前往胶东，开展调查工作。一来胶东，联合调查组就直奔烟台地委说明来意，请求协助。地委召开电话会议，要求各县区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，各县区公安、民政、武装部通力配合，支持调查组开展调查。各地通过广播、贴寻人启事等形式，查询杨子荣的籍贯、身世。仅三天时间，调查组就收到 127 条线索。对于其中有价值的线索，调查组找相关人员面谈、核实，但没有一人与杨子荣姓名相同。

有一天，牟平县城关公社民政干部马春英提供了一条线索：许多年前，嵎峡河村有一位老太太，老来查儿子当兵的事，可她说自己儿子叫杨宗贵。而且，她儿子参军后一直没给

五、结识古董商克拉克娜

因屡屡受挫，李茗沁决定不再去欧洲，就把琳娜李、林老板等信息给了秦汉。曹秘书知道后很兴奋，说李茗沁能力不行，希望秦汉让他去试一试。李茗沁钱被抢，只有协会有几个人知道，结果传到了外面。古玩街上的老板都笑话他，钱也看不住，还要去淘宝？！秦汉知道他要退却，就盯着他说，遇到挫折就退却，非男子汉所为。再说人生在世哪有不受辱的？韩信钻别人裤裆，勾践舔敌人大便，这受辱够可以了吧？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受了大辱，这么多珍宝文物流失，个人受点委屈能把这些文物收回来，值不值？李茗沁认为秦汉高看了自己，自己没有这个能耐，不具备坚忍不拔的品质，就说这些天为了看女儿，前妻较较故意阻碍，使得他一直牵肠挂肚，跟娘们似的。他深感自己窝囊，外面闯荡一事无成，家里又这样疙瘩，自己干不了大事。

琳娜李来电，向他描绘冯德公园的郁金香盛开了，美极了，何时过来看看？还报告他，上次林老板那几小拍，由于她的顶价，日本人没有占便宜。林老板也来电邀请，说又准备搞一场家庭拍卖，还发来很多图片，李茗沁看后感慨，欧洲确实有好东西。徐楣丽、秦汉都说好，这些唐宋文物十分难得。

李茗沁又踏上欧罗巴的土地。林老板来接机，直接把他带到了仓库，李茗沁整理了货架，剔除了一些仿品。林老板让他先挑选，剩余的参加拍卖。李茗沁挑了一些，也替徐楣丽选了几样。之后在茶会上，见到了古董商克拉克娜，意大利古董商迪西奥。李茗沁抓紧时机跟他们混熟，特别是克拉克娜，生在荷兰，热爱中国艺术，对自己在荷兰的发展会有帮助。聊起日本茶道时，他想卖弄一番。不料克拉克娜认为日本茶道虽然来自中国，但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。

喝完茶，家庭拍卖会开始。所谓的拍卖会，其实就是在仓库一边放一张大桌，围坐着几十个人，桌前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打着手势叫价，旁边助手举起桌上的拍品，显示器物的底部或背部。拍卖师语速很快，手势风

家里写信。后来传说他开小差当了土匪，村里停止他家的代耕和军属待遇。老太太不服，到县里找了几百回。后来，县政府认为证据不足，于 1957 年和 1958 年先后认定杨宗贵为失踪军人、革命牺牲军人。

调查组把情况向在北京的曲波等人作了汇报。1969 年 6 月 29 日，曲波给调查组回了一封信。信的主要内容是：“一、年龄，当年（1945 年）29 岁和 30 岁。二、有妻子，小孩有否不详。三、杨子荣当兵时改名参军可能性较大，否则其家属为什么多年不向我联系呢？四、中等身材，一米七至一米八。五、为人活泼、热情，能言善道，人缘好，社会知识丰富，农耕是好把式，能下力吃苦。酒色财气不沾。他曾对我的警卫员刘希茂说过这样四句话：酒是穿肠毒药，色是刮骨钢刀。财是下山猛虎，气是惹祸根苗。”

不久，调查组又根据 1968 年杨子荣老战友的回忆及曲波来信提到的情况，访当年领杨子荣、韩克利一起到雷神庙报名、体检的孙承祺，又找到了当年村里和邻村当兵的人和本村一些人，还专门访了杨子荣胞兄杨宗福，他们所谈的情况与曲波等人的回忆是吻合的。初步确认，杨宗贵和杨子荣为同一个人。

1974 年秋天，关会元去北京让杨子荣的战友辨识一张翻拍的、放大的杨子荣照片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这不是杨排长吗？从哪儿得到的？”与此同时，这张照片又送到嵎峡河村让村子里的老人们指认，老人们都说：“这不是宗贵吗？”当照片送到杨宗福手中时，他先是泣而无语，过了一会儿，号啕大哭。

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，中共海林县委、县政府先后五次修建烈士墓碑、两次重修杨子荣纪念馆。杨子荣烈士陵园也被黑龙江省政府批准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1991 年，中共牟平县委、县政府为纪念这位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，在县城中心位置建起了杨子荣广场，在城南杨子荣参军集合的雷神庙西侧，建起了杨子荣烈士纪念馆。

（摘自《党史博览》2015 年第 3 期）

格简洁明了，场面一下子被调动起来，举牌的人踊跃，常常几双手同时举起。拍卖结束后，林老板招待大家喝香槟，给他介绍了英国古董商伯伦。李茗沁暗暗惊讶，这么快找到了这个人，好兆头！太平刚买下奥古斯都二世珍藏的青花瓷，正与伯伦、克拉克娜等人讨论这类瓷器。伯伦强调说，应该收藏欧洲帝王购买的官窑瓷器，这件青花瓷是民窑外销瓷，价值不

高。李茗沁故意附和。克拉克娜看了看他说，我们讲价值不高，是站在我们的立场，李先生是中国人，应该知道外销瓷对贵国有特殊价值。李茗沁郁闷，想讨好她，总是对不上路。伯伦与太平争夺那些宫廷收藏的外销瓷，大多败下阵来，非常不满，说你连有英国皇家风格的中国外销瓷也要跟我抢，那件意大利美第奇瓷器便宜，你不买。太平笑道，场上对手，场下朋友嘛。一边的迪西奥走上前说，什么话，很多人不懂美第奇瓷，按理说，应该比你们英国瓷贵。

李茗沁说，起初的外销瓷质量不错，尤其是景德镇窑的青花、五彩瓷，部分供给欧洲宫廷，但由于大量订货，来不及生产，质量就下降。伯

伦瞥了一眼李茗沁，开始攻击中国当代产品粗糙，与古代有天壤之别，当代中国成了垃圾制造工厂。李茗沁没有想到他们说话那么直截了当。这几周，活动很多，李茗沁都参加了。特别是几场小型家庭拍卖，与伯伦、迪西奥、克拉克娜等人经常碰面，谈话也融洽多了，同时与其他古董商也熟悉了起来。李茗沁发现，在探讨中，总有人嘲讽中国现状，如伯伦等人。而克拉克娜，嘲讽的同时会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，比如中国政府要是这样，等等。李茗沁本来把伯伦列入“收藏家”的猜想当中，如果真是他，就会产生麻烦，要想从一个对中国没好感的人手里收购藏品，谈何容易。

李茗沁一回国，徐楣丽就托朋友来取走了替她买的货，还打电话夸他眼力好。秦汉看了货也赞不绝口，要李茗沁暂时保管这些文物，协会正考虑建立一个博物馆。秦汉又打听到更具体的信息，那个荷兰藏家是一个老侯爵，珍藏中有一件精品元青花。

共和国记忆

李 菁



15. 受伤最多的将领之一

与那个年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，刘伯承也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意志力。1916 年，刘伯承在参加护国战争的丰都战斗中头部连中两弹，一弹擦伤颅顶，一弹从右眼太阳穴射入，穿透右眼眶出，使他失去了右眼。当时缺医少药，又延误了治疗时间，伤口感染化脓，危及生命。刘伯承在地方好友帮助下才秘密潜入城中，找到德国著名医生威廉·阿曼做手术。

“那时候的麻醉药副作用相当大，可是父亲作为部队指挥员必须保存好脑子，所以他坚决拒绝麻醉。”在无麻醉的情况下，医生为他清除眼眶内的腐肉，刘伯承双手紧紧捏住手术台的木角，咬紧牙关整整坚持了三个小时。手术结束后，德国医生问：“疼得厉害吧？”他忍住剧痛还幽默地回答：“割了 74 刀。”德国医生连连感慨：“佩服，佩服！”刘伯承一生负伤 11 次，其中重伤 9 次，也许这是中共重要将领中受伤最多的人之一，那些伤疤也是刘伯承戎马一生最真实的记录者。刘蒙说，父亲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如果说我作战有些经验的话，那是子弹告诉我的！”

在很多人的回忆中，刘伯承和蔼慈祥，但在刘弥群、刘蒙看来，那只是父亲的一个侧面。孙子对带兵打仗者要求是“智信仁勇严”，在朱德眼里，刘伯承正具备了这样的品质。

1947 年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带领部队执行“挺进大别山”战略任务，前面淮河挡住去路，后面眼看追兵已到。刘伯承想带部队涉水过河，派参谋前去探查。参谋是个喝了些墨水的小知识分子，回来报告说：“大水滔滔，难以过河。”刘伯承当即批评他：“你应该看水深、流速、河底情况等，‘大水滔滔’是什么概念？”他自己带了一个警卫员，找了一个小闸子下了河，手拿一根竹竿亲自试水深，然后看见一个饲养员从上游拉牲口过了岸，刘当即判断：可以过河。他们在河两岸拉起长长的绳子，士兵们趟着快涨到脖子根的河水，迅速转移到河对岸。也算天意，当追兵赶到，河水已经涨得

老高。“表面看这含有运气成分，但是如果没有父亲对实际情况的观察、了解，就不会有这样的‘运气’，部队也逃不开全军覆没的命运。”刘弥群说。

刘蒙讲了这样一件事：刘伯承率部队进军大别山时，下令把包括马车等装备都甩掉，轻装行军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在朦胧中看见行军队伍中仍有一辆马车，一问，是作战科长的。这位平素被刘伯承看重的作战科长解释说，作战科东西多，所以还需要用马车运，刘伯承大怒：“来人，把他绑起来！”于是这位作战科长被五花大绑，一直跟在队伍后面行军。“部队里最讲究‘信’，军令如山，这一点上，父亲要求得很严的。”

刘弥群很直率地说，她对一些影视作品里塑造的刘伯承形象颇有意见：“如果都像他们刻画的那样，像老妈妈一样，哪能带兵打仗？”她说，父亲骂人也骂得很厉害，遇到打败仗的手下，他批评人家“是娘儿们”，毫不留情。“有一次军事演习时他想用飞机不被允许，就说：你是慈禧太后，这个国家都是你的？！”

古代兵书对将者提出“冬不服裘”“雨不张盖”的要求。1937 年一二九师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时，刘伯承统率的部队不过万人，天下着大雨，他“雨不张盖”。12 年后，1949 年 7 月 7 日，南京举行阅兵仪式，又是下雨，这时他统率的部队已达几十万人，仍旧“雨不张盖”。第二天的南京《新华日报》对阅兵典礼的报道有这样一段描写：“天正下着雨，而刘司令员却几次拒绝了警卫人员送上去的雨衣。他淋着雨，注视着台下经过的战士的行列。队伍行进得很缓慢，刘司令员这时向李达参谋长说：‘步伐还可以加速一些，战士们都没有带雨具。’”

1956 年，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，参观南京军事学院。由于刚授衔，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、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。不巧当天又下起大雨，有人舍不得刚发的新礼服，于是向刘伯承建议，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里进行。刘伯承回答：“事关国威军威，哪能随心所欲！”结果仪式当天，他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礼服，拒绝雨伞，陪同外宾前来的陈毅见此情景也拒绝了雨伞。两位元帅英姿焕发，冒雨欢迎外宾，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，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蓬帕杜夫人的珍藏

程庸

